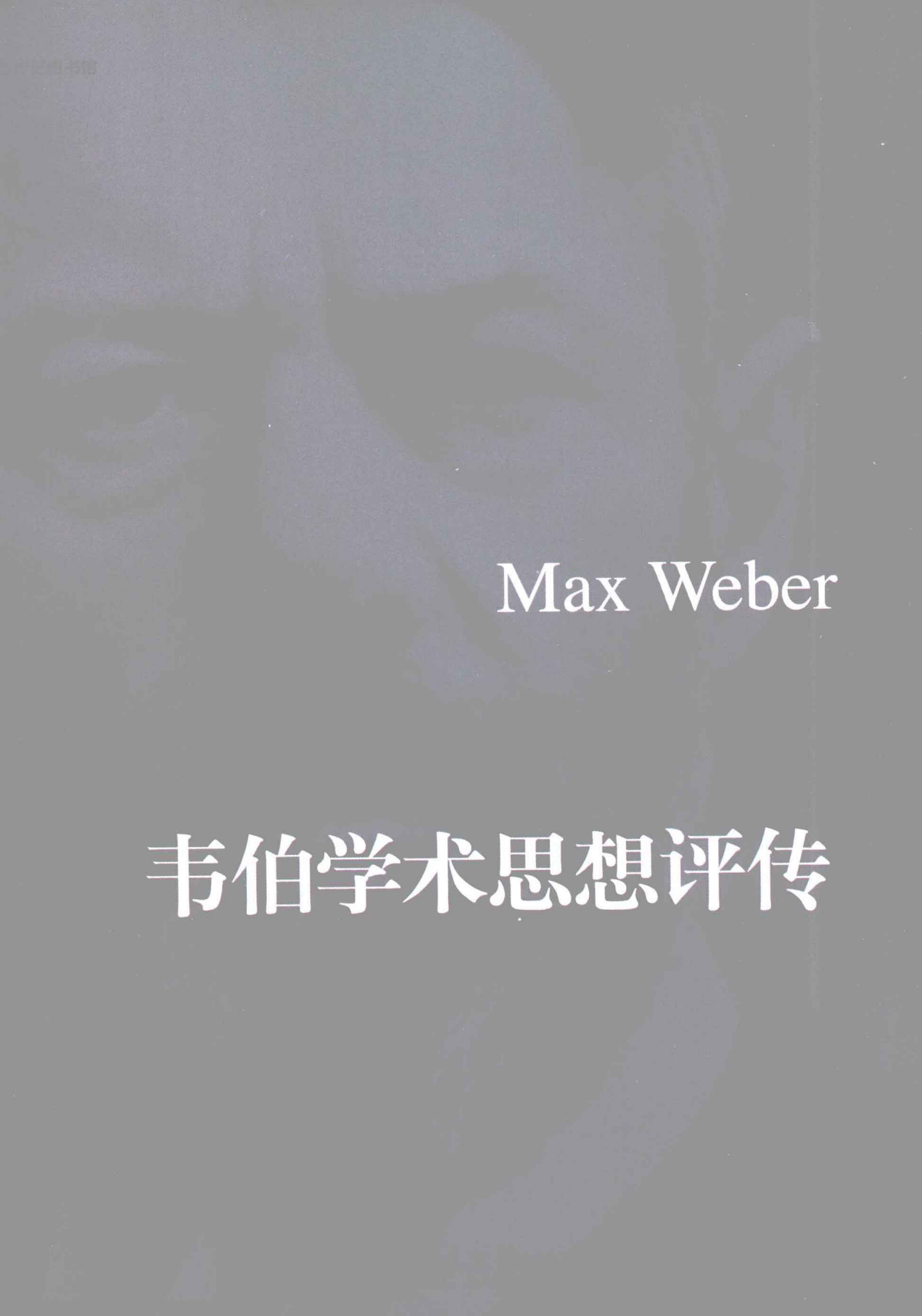




Max Weber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

未名传记图书馆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

[美]弗里茨·林格 (Fritz Ringer) 著 马乐乐 译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32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美)弗里茨·林格(Ringer, Fritz)著;马乐乐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未名传记图书馆)

ISBN 978-7-301-16626-0

I. ①韦… II. ①林… ②马… III. ①韦伯, M. (1864 ~ 1920) — 评传
IV. ①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3526号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by Fritz Ringer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Copyright © 200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

著作责任者: [美] 弗里茨·林格 著 马乐乐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626-0/C·07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320千字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时代中的韦伯.....	7
韦伯置身的学术场域	8
德国历史传统	19
德国古典社会学的兴起	34
第二章 韦伯的政治学.....	47
农业问题和韦伯的民族主义	48
韦伯的自由主义	63
走向民主联合	72
第三章 韦伯的方法论.....	87
个体性因果分析	91
解释性个体主义与理想型	102
客观性、价值中立与价值多元主义	119
第四章 新教伦理.....	129
最终文本	130
争议：韦伯与桑巴特	141
新教教派：韦伯在美国	149

第五章 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	163
构建一个比较性的世界历史 ·····	164
宗教与世界 ·····	173
中国的宗教与印度的宗教 ·····	183
第六章 从历史学到社会学·····	199
经济与社会 ·····	200
权威的类型 ·····	208
法律社会学 ·····	218
第七章 城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官僚制 ·····	229
西方城市 ·····	230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官僚制 ·····	238
官僚制的两张面孔 ·····	246
第八章 教育、知识与志业 ·····	253
教育与专业化；阶级与身份 ·····	253
科学作为一种志业 ·····	259
以政治为业 ·····	272
结 语 韦伯，我们的同时代人 ·····	281
参考文献·····	287
译后记·····	297

导 论

马克斯·韦伯生于 1864 年。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受过法学训练的政治家，是民族自由党（the National Liberal Party）中的重要一员——该党接受了俾斯麦的独裁式领导及德意志帝国的官僚君主制。他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Helene Fallenstein Weber），是一个相当虔诚且道德上甚为严格的人，逐渐与她守旧的丈夫老韦伯相疏远。韦伯自己对宗教相当感兴趣，但却从未成为一名信徒。作为一个天才少年，韦伯从他自己的阅读中所学到的，要远远超过他从德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中学教育中所学到的。1882 年，韦伯步他父亲的后尘，以法学学生的身份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同时兼修历史、经济学和哲学课程。与此同时，韦伯加入了一个决斗兄弟会，有时也喝点啤酒，大体说来享受着那时颇具德国学生生活特色的各种社交。^[1]

1883—1884 年服过一年役后，韦伯开始在柏林的法庭实习，与此同时继续他的法学研究。一直游走于法学与经济史边缘的韦伯，最终于 1889 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讨论的主题是西方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1891 年，韦伯发表了他的第二篇论文，研究的是古罗马农业史，正是这篇论文，为他赢得了在大学里教授商业法、德国法和罗马法的资格。在柏林大学短暂停留之后，韦伯于 1894 年接受了弗莱堡大学讲授经济学的全职教席，时年三十岁。两年后，他转

[1] 注释中引述的文本一律采用缩写形式，文本的全名见参考文献（参见参考文献的开头说明）。除了 Marianne Weber 所著的 *Max Weber*，也可参见 Bendix 所著的 *Max Weber*，1—6。

入海德堡大学，就此开始了他成功的学术生涯。1890年早期和中期，韦伯组织了一次对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亲自分析了调查结果。在此过程中，他变成普鲁士地主阶层的反对者和德国工业化的提倡者。

1893年，还在柏林教书的韦伯，与他的远方表亲玛丽安妮(Marianne Schnitger)结为连理。韦伯夫妇相互忠诚，但是他们的婚姻显然并不完美。这在阿瑟·米斯曼(Arthur Mitzman)所写的韦伯心理传记中有权威的报道，传记中同时还提到了韦伯年过四十之后的几次婚外情。米斯曼的主要兴趣集中在韦伯身上那强烈的抑郁症上，它在1898—1902年这三年时间里几乎把韦伯击溃，并在韦伯余下的生命岁月中，依然时断时续地伴随着他。极有可能是韦伯遗传了躁狂抑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倾向，因为他的一些亲戚也有这一症状。然而，米斯曼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韦伯第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抑郁时期，起因于1897年韦伯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而产生的负罪感。那次冲突中的争议点是：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是否能在没有她丈夫的陪伴下，单独去探望韦伯和玛丽安妮。当老韦伯强硬地插手这一事件时，韦伯把他的父亲赶出了家门，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去世前父子俩尚未和解。^[2]

然而，韦伯在1898—1892年间长期患病，对他的学术工作而言，至少有两个实质性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他思考的方向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所思考的问题变得更加宽广与深刻。他的学术旨趣从经济和法律史转向方法论问题，另一方面则转而研究起新教禁欲主义(Protestant Asceticism)。1904年，他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及贾菲(Edgar Jaffe)成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献》的编辑，《文献》的“开场白”，就是韦伯那篇论述“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的著名论文。一年后，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的第一部分。第二个后果是，他辞

[2] 在*Iron Cage*一书中，米斯曼把海伦妮·韦伯刻画成一个受害者。不过我自己在阅读玛丽安妮所写的韦伯传记时的感受——在那本书中海伦妮有着令人畏惧的道德呈现——让我怀疑米斯曼是否正确地阐释了这一导致韦伯与其父亲闹僵的事件。我的直觉是，海伦妮是那个家庭的真正操控者。我感兴趣的是，海伦妮的丈夫是怎样被明确地排除出这次探望的，以及玛丽安妮是怎么被确信应该扮演海伦妮的忠实女儿这一角色的——事实上，这一角色并不符合玛丽安妮的最佳利益。也可参见Krüger的敏锐研究*Max und Marianne Weber*。

去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这一别就是十多年，直到 1918 年接受慕尼黑大学的教席，他才又重返讲坛。当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 (Alfred Weber) 已经作为一名杰出学者得到公众认可时，韦伯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中，却依然仅仅是一位私人学者。不断复发的失眠和精神衰弱，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于 1920 年因肺炎而英年早逝。

不过，在这些抑郁发作的间隙，韦伯却能以超常的能量投身工作。他通常在同一时间着手进行两三项研究。生病之前，他一边考察农业问题，一边研究证券交易。1904 年《新教伦理》发表后，他去美国参观了三个月。1906 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 1905 年俄国革命的评论，为此他还自学了俄语。1908—1909 年，韦伯发起了一项针对工厂工人心理状况的调查，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展开了一项颇具典范意义的在地研究 (an exemplary local study)。在一战爆发前的岁月中，韦伯参与组建了德国社会学学会，帮助学会界定其主题并开展相应的经验研究。与此同时，韦伯又开始了两项主要研究，研究结果直到韦伯去世后才最终发表。其中一个是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手册，这一手册在韦伯去世后以“经济与社会”为题发表；另一个则是极为庞大的对各大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比较性研究。一战期间，韦伯参与管理了海德堡一家军事医院。他同时也撰写激情澎湃的政论文，提倡议会改革，激烈反对其同事中广为流传的兼并主义热情。在魏玛共和国的开创年代里，韦伯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活跃性与影响力。总而言之，在 1904 年到 1920 年五十六岁去世这段时间里，尽管常常疾病缠身，韦伯却写出了惊人数量的学术作品。

在以下章节中，我将会分析韦伯著作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些文本。我会把注意力放在韦伯著作中那些在我看来构成韦伯学术生涯最为核心的部分。我希望以这种方式，给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学生与学者，说得更广些就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供一个相对深入的关于韦伯的导论。希望大家看过本书，会有兴趣去读韦伯的原著，而不是把本书当成韦伯原著的一个替代。对英美读者来说，已有一系列关于韦伯的优秀译著可供阅读。在阅读韦伯的过程中，可以与本书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这样阅读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总而言之，我的目的是，为

人们阅读韦伯的著作，以及进一步研究韦伯的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以下章节是对韦伯最耐人寻味的文本之阐释 (interpretation)。虽然有时还会包含一些简短的批判性评论，不过总体而言，我主要试图勾勒出韦伯事实上说了什么，或是用尽可能清晰明了的语言来重述韦伯说了什么。在阐释的过程中，我有意采用了韦伯自己所提倡的阐释规则。我的前提假设是：韦伯的著作不仅自成一体，相互间也是连贯一致。甚至当我遇到模糊或矛盾之处，我也会探寻这些模糊和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它们能对我们理解韦伯的思想有什么启发。我不会试图去超越韦伯，也就是说，我不会试着去得出一个比韦伯自己的社会理论更具整全性 (comprehensive) 的社会理论。因为，事实上，面对悖论 (paradoxes)，韦伯的处理十分具有典范性。他是第一个提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关键问题的学者。在总体性计划的构想已经消退之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显得尤为突出。韦伯比其他思想家更加深刻地思考了官僚制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扩张，以及这种扩张与教育资格证书漫天飞舞之间的关联。为了维护自由的传统，韦伯与大众政治的某些意涵进行抗争。他探寻了，在现代性的理性化环境中，自主的个体存在的前景。他思索了，在一个后宗教的世界中，科学知识 with 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试图重新界定，在一个多元和民主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总之，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

正在编辑中的韦伯文集的校订本 (*Max Weber Gesamtausgabe*)，给了我很大帮助。它有丰富的注释，当然它也尚未完备。对韦伯思想的最终分析，即便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显然也不是现在就能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与韦伯自身著作相比，我对关于韦伯的大量二手文献了解甚少，比如说对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中关于韦伯的争论我就了解得比较少。我受到了韦伯研究的杰出权威们的决定性影响，但要我一一指出哪些地方我同意、哪些地方我不同意这些前辈们的看法，未免太过繁琐。那些想要进一步了解我的“学术债”的同行学友，可以参看书后参考文献，那里涵盖了韦伯著作的全部汇编，指出了以缩写形式被引用的文集的全称，罗列了最重要的英译本 (除非另作说明，本书中引自韦伯著作的英文段落都由我自己翻译)。请允许我自我说明一下：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或

社会理论家，而是一个从事社会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另一方面，我讲韦伯已经讲了四十多年。韦伯一直是我方法论上的可靠“顾问”，也是我第一本书的主角。韦伯在我所写著作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烙印，而非仅仅是我的研究主题的某个部分。不管是在我试图理解德国社会史和学术史的时候，还是在研究现代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比较史时，抑或是在考察文化社会科学的关键性方法论问题上，韦伯的思想一直引导着我。我的学生和朋友都知道，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韦伯主义者（Weberian）。因此，对我来说，这份研究并非我学术工作的最后拓展，而是它的最终完成。对社会学专家来说，我所写的东西可能看上去比较陈旧或不合常规。然而，如果我成功地增强了韦伯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我就达到了我的目标。

正如我将要表明的，韦伯思想的统一性，并不在于他的方法论，更不在于他对李凯尔特的学术继承。同时，我也不接受那种认为韦伯主要是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看法。与韦伯同时代的几乎每位欧洲知识分子一样，韦伯把民族利益放在其他利益之上；但与他的大多数同行相比，韦伯对德国民族利益的理解，要更有节制，更加现实。我也反对这样的看法，即韦伯对大众领袖民主的论述，使得韦伯无意中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先知。相反，我把这一误解视为当代德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他们中有太多人已经失去了与他们那值得纪念的祖先之间的关联。因为韦伯首先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a liberal）。我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学术圈中，韦伯是魏玛共和国的一个相当罕见的支持者，准备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同时激烈地反击各种反动性的神话和派系，正是这些神话和派系，推倒了共和国，给了希特勒可乘之机。我坚持认为，韦伯思想中的潜在统一性，正在于他的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我将要描绘的韦伯学术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的核心，正是献身于此。

时代中的韦伯

用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史学家的方式来阅读韦伯的作品，就是要把这些作品放到它们的背景中去加以理解。我追随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做法，将韦伯所处的文化世界描述为学术场域 (**intellectual field**)。在布迪厄的用法中，某个给定时空中的学术场域，是由一系列占据各种学术位置的行动者 (**agents**) 构成的。然而，场域并非许多孤立元素的一个加总，而是由一系列关系构成的一个结构或网络。场域中的元素，不但以特定的方式相互联系，而且每一个都有一个独特的权威，因此，场域同时也是对符号权力的一种分配。场域中的行动者，则对以下问题的界定权展开竞争：什么样的东西应该被视为学术上够格的和文化上正当的？然而，布迪厄的定义中，最关键的要点在于，观念所具有的位置性或关系性特质。某个特定场景中所表达的各个观点，相互界定得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只有把它们放在互补或对立的关系中，才能充分地刻画它们。学术场域自然会受到各种更广阔的社会议题的影响，然而，它依然有其自身的逻辑。^[1]

一个学术场域或子场域的各个部分，都会受到该场域中支配性正统的强烈影响。甚至最异端的位置，也会因其或多或少指向其所反对的正统而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正统和异端这两者，都奠基于由默会的假设 (或默会信念，即 “**doxa**”) 所构成的一个文化前意识 (**a cultural preconscious**) 中，这些默会的假设，经由

[1] Bourdieu is cited in Ringer, *Fields of Knowledge*, 4–12.

继承来的实践和社会关系而牢固化。在变迁和冲突时期，至少这些默会信念中的某些会变得明确，从而可以对它们加以分析和澄清。在不同寻常的经历的冲击下，或是由于极强的智识上的力，少数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批判性地重新审视他们的传统。他们会澄清(clarify)某些重要信条而放弃其他信条，由此超越他们所在世界的局限。我确信，那些具有原创性且前后一贯的思想，总是某种澄清(clarification)，它意味着，与一个文化的未被考察的假设，保持一种分析性的距离。相比顽固的唯心主义者之“作为初始因的新观念”这一想法，我认为上面这种模式的澄清，更少神秘化。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清明(clarifying)思想家之一。即便他也分享一些他那个时代的默会信念，他仍然重新考察、重新论述并部分超越了他所处的学术场域中那些支配性假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仍会对他的著作感兴趣，同时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刻画他所处的学术场域来开始我们的论述的原因所在。

韦伯置身的学术场域

韦伯继承并改造的德国学术传统，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约1800年左右，德意志联邦(German states)发生了一场教育革命，它远远早于英国和法国，并远远早于工业革命在德国的到来。这一转型中的一个要素是，出现了“研究律令”(research imperative)，即期望大学教员能够从事原创性研究，并培养学生从事原创性研究的能力。另一个因素是，针对未来从事中等教育的老师，建立正式的考试和文凭制度，以及最终也针对其他有教养的专业，引进相似的资格证明。在所有现代欧洲社会中，高等教育最终变得与财富及经济实力一样重要，成为中间阶层自我形象的一个来源，这一点在德国尤其如此，因为在德国，教育革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则相对发生得较晚。

1800左右的几十年，普鲁士与其他德意志联邦中，发生了激进的大学变革，与其他专业化科系相比，赋予“哲学”系尤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改革运动，为

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所激励，同时也受到对古希腊的新人文主义热情及教养这一理念 (the ideal of Bildung) 的激励，所谓教养，即在自己培育意义上的教育。根据这一理想，学习者通过与经典文本（主要是古典古代^[2]的文本）的解释性或阐释性互动，能够增强其整体人格。这一看法，构成德国有教养的中上阶层的意识形态。我在另一本书^[3]中，称这种类型的精英为“士大夫” (mandarins)，即其社会地位主要基于其教育资格，而不是基于贵族出身或财富与经济实力。这一士大夫精英阶层，包括高级官僚、教师、神职人员、有教养的自由职业成员；大学教授是这个阶层的自然代言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就作为自尊和社会荣誉的来源而言，唯有教养可与贵族出身相匹敌。然而，也只有在德国，这一教养的风格具有一种近似形而上学式的性质。用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便于人类的心灵能够通过认识这个世界来实现心灵自身的潜力。

如果说，从18世纪晚期开始，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都在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向教养这一观念看齐，那么，许多看似没有联系的事情都解释得通。19世纪的德国研究型大学的许多活力，来自一股新人文主义热情，其关注点更多是希腊而非罗马。研讨会 (research seminar) 的诞生，以及相伴随的哲学性科系的扩张，都与阐释性的、语文学的、历史性的学科 (interpretive, philological, and historical disciplines) 之兴起相关。正是这些学科，而非自然科学，最早界定了严格的学术所应有的规范。科学 (Wissenschaft) 这一术语，说得宽泛些包括所有系统性学科，当然也包括解释性学科。德国学术圈中有一种普遍信念，即通过富有成效地参与学术研究，常常能够并必然会产生有教养的效果。具有原创性的学者，注定能从丰富心灵与个体的活动中产生。从19世纪开始，这一期待也被表达成如下主张：学术或者说科学，会使人产生出一种“世界观” (worldview, Weltanschauung)，一种整全性的并且部分是评价性的世界观。追

[2] 这里所谓的古典古代即古希腊和古罗马，从上下文看，尤其是指古希腊。——译注

[3] 指林格非常有名的作品《德国士大夫阶层的衰亡》(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译注

求真理,(被认为)能够促成诸如内在的洞见、确定的道德、个体性的知识或智慧。无论如何,那种从学习或科学中获取教养和“世界观”的渴望,在韦伯时代的德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然而,韦伯自身则反对这一无处不在的假设。他挑战以下信念,即认为德国大学能给学生提供专业训练以外的东西;并坚持认为,应该将价值判断与专业学习严格区分开。

就像期待科学能够产生“教养”这一想法是有问题的,科学和实践性关切之间的传统性分离同样有问题。虽然在德国古典的中等学校教育中,数学占有一定位置,但很显然,阐释性研究被认为是教养的主要源泉。由于科学被与教养这一目的联系到一起,因此,“实践性”、实验性的知识,便被视为低一个档次、难以概念化。实验室科学依靠的是,对环境进行可控制的介入。然而,在德国,论述教养和科学的严肃作品,很少有对实践性活动的正面指涉。相反,它们经常猛烈批判对知识进行工具性或“功利主义”式的构想,同时它们几乎是自动地把“纯”科学等同于是非实践性的。一个象征等级制由上而下拓展开来:从最上面的抽象理论,到实验性及因果性的分析,再到最下面仅仅是“技术性”或“应用性”的研究。因此,19世纪的德国研究型大学,一般来说,更注重断绝功利主义对科学“纯粹性”的侵害,而不是保护异端和学术多元。韦伯悲痛地意识到了这一偏见。

现代德国大学,由邦国(territorial states)所建立。(邦国的)君主政府,需要受过训练的官员,并试图监督神职人员、中学和大学教师,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的教育和资格证明。理论上,大学教员的法定权利,可以保障他们享有学术自由,独立委任和选拔他们的同事。但在实践中,国家的教育官员们,在这些事情上,成功地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而且官僚君主制这一事实上的控制(de facto control),在德国学术圈中也越来越被接受。更为可怕的是,科学的抽象纯粹性,最终被用来公开禁止“党派性”的社会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德国大学教员通常认为,提倡“民族理由”和“整体的善”,以反对公开性的“利益”政党的自私自利,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文化国家”(Kulturstaat, culture state)的士大夫式信条,可以这样来解读,即统治的正当性,并不是来

自于对被统治者利益的追求，而是来自于对民族的知识生活之支持。所有这些态度合流的结果，是一种有偏见的然而却被设想为是非政治性的民族“唯心主义”政治观。韦伯自己也是一个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但他揭露了，（在当时的德国）“民族”这一词汇，事实上被误用来保护普鲁士地主阶层和官僚君主制。他也严厉地批判了“德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这一看法，因为，只要异端的和激进的批判观点原则上不被宽容，德国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这里我只能稍微论述一下，教养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于1800年左右的兴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各股合流的思潮中存在着一个确定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背后的组织原则，是由一组某种程度上自觉的关于“教育、理解及学习”的信念所组成。洪堡被认为是现代德国大学的智识上的奠基人。然而，他关于教养和科学的理论，不仅被德国新人文主义和唯心主义所影响，也被他那个时代教育学上的争论所影响，同时也被语言学的、解释性的实践所影响，正是这些实践，把新人文主义者的冲动，转化成了一个系统性学问的典范。虽然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教育与经济个人主义及政治理性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但是，唯有在德国，教育成为新知识阶层首要关切的内容，与此同时，经济个人主义则依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主题。

我的另一个历史性观点是，在1800—1900年间的某个时候，教养的含义有所改变，这一改变最好被描述为，强调重点由前瞻性或者说“乌托邦式”的那一面，转移到了防卫性或者说“意识形态化”的那一面。1800年左右，通过教养而达至自我提升的观念，挑战了建立在出身之上的永久性社会区隔，（此时）这一挑战从社会上看是进步的，而且是普遍主义的。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高等教育，但在原则上，它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正在兴起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成员），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他自身是一个开放的，或者说有美德的精英，一个有才华和个人价值的新贵。为教育说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所有反对（不公正的及与人性无关的）社会障碍的人们说话。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1900或1920年左右，高等教育自身已经带有“区隔性社会特权”的特质。随着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文凭体系的制度化，教育资格已经变成社

会地位的固定来源。有教养的中上层，试图控制新的社会群体涌入大学，以此减少学术职业中的竞争。

随着教养这一概念带有“巩固社会地位”的特质 (a socially confirmative character), 它的一些其他含义也有所改变。洪堡在其某些早期著作中坚持认为, 唯有通过自由个体在互动中的发展, 才有可能带来人类提升。这一文化个体主义, 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是在其 1809—1810^[4] 年间为普鲁士高等教育重组所制定的规划中, 洪堡也仍然认为, 国家仅仅是为学习的自主性生活提供一个物质环境而已。然而, 他最终还是对国家插手大学事物作出了让步。更重要的是, 对后来的许多大学教授来说, 这一让步看起来加没有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开始视自身为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时, 他们倾向于把现存政权看成“文化国家”(Kulturstaat) 的担纲者、民族文化公正无私的支持者和代表。他们大都坚定地支持君主官僚制, 反过来, 君主官僚制也保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被威胁), 并接受他们作为民族统一体代言人的要求。^[5]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 1800 年左右, 教养曾被赋予一个全体性乃至超验性的意义 (a collective and even transcendent significance), 不过, 这一意义在接下来的世纪中逐渐消散了。早期的德国人文主义者, 严肃地在古代中寻求带有普遍性、永恒性的文化规范。德国唯心主义的祖先, 新教徒们, 也赋予对教养的追求以一种宗教意义。虽然这一意义受到清教主义中个体主义因素的影响, 但它仍将教养和人类救赎这一普遍性远景联系到了一起。用德国唯心主义的形上语言来说, 心灵 (Mind) 的自我实现, 是人类存在的超验目的。然而, 随着精神内涵的逐渐消退, 以下状况变得越来越具有侵害性, 即无论是洪堡, 还是那些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们, 都既没有对个体教养的社会先决条件采取一种清晰的立场, 也没有对教养(将对共同体所有成员)造成的现世后果采取一种清晰的立场。在这一精神和社会真空中, 孤立个体的培育, 最终变成无根基的、极为私人的事情 (gratuitous and strictly private enterprise), 一种更高形式的自私。

[4] 原文是 1909—1910, 应该是印刷错误。——译注

[5] Humboldt, “Über die... Organisation.”